

首届“中国经济史研究：前沿与趋势” 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李一苇 沈博

2022年12月3日,首届“中国经济史研究:前沿与趋势”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线上成功举行。本届研讨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体制改革研究室、《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和中国经济史学会近代史分会联合承办。十四位资深学者应邀出席研讨会并作专题报告,来自海内外多所高等院校和研究单位的数百名专家学者和青年学子在线与会,共同围绕经济史研究前沿的理论和方法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

专题报告分四场进行,海内外学者就经济史研究中的理论与方法,以及涵盖财政、货币、金融、企业、中西比较、经济周期、史料发掘整理与运用等具体问题和领域,或分享前沿成果,或作出回顾展望与评述。

一、经济史研究中的理论与方法

北京大学李伯重教授关注我国经济史研究中的范式问题,报告题目为“‘范式’与‘范型’:经济史研究中一个重要概念的辨析”。他认为,相较于以往国内学界流行的“范式”一语,“范型”更能表达库恩所提出的 Paradigm 的概念内涵。经济史学研究的基本范型包括历史唯物论、历史进步论、历史分期论和社会变迁论。有鉴于中国学术研究的主要模式源自马克思的古典理论,而西方学术研究的主导模式经历了从以马尔萨斯理论为基础到以亚当·斯密理论为基础的转变,中国经济史学则应坚持以斯密-马克思理论为基础的研究范型。

上海交通大学曹树基教授做了题为“内史与外史: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的报告,从跨学科的视角阐释经济史研究中的方法论。他指出,在“外史化专门史”语境中,学科只是一个专门领域或论域;而“内史化专门史”更侧重于从各个学科知识体系中提出问题,并应用各学科的专门知识解决问题。他以当前科技史和经济史领域的研究为例,详细阐释“外史化专门史”和“内史化专门史”的基本内涵及其代表性成果。并强调,几乎所有的历史都是专门史,专门史涉及专门学科,而不只是专门领域,因此,中国经济史研究者要注意做内史化的经济史和中国史。

中山大学刘志伟教授回顾和反思了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理论体系,报告题目为“走向人的行动科学——中国经济史的方向”。他基于波兰尼和米塞斯等人的研究认为,目前经济史学研究在市场机制的基础上关注国家力量、重视制度变迁的做法,应该进一步向前拓展,关注个人的行为。有鉴于传统中国的“食货”概念相当符合波兰尼所提的实质意义上经济学的研究,他主张经济史学研究者要在一个更广阔的研究视野、概念体系、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中,将从中国历史经验中提炼出的分析方法与18世纪后盛行的市场机制分析方法相结合,构建更具整体性和解释力的经济史研究理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封越健研究员的报告题目为“古今贯通·科学方法·实证研究:社会调查所与中研院社会所的经济史研究”,其以学说史为切入点,探讨经济史研究方法。他高度评价

【作者简介】李一苇,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邮编:100836。沈博,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邮编:100836。

了1949年以前中国本土经济史学研究的主要阵地和优良传统,指出两所前辈研究者开创的古今贯通、重视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和关注实证研究的学风,当今仍须继承发扬。古今贯通指经济史与现实经济的贯通研究,以对现实问题的关注作为研究历史问题的根本出发点,以对历史问题的研究作为明确和解决现实问题的重要依据。重视社会科学方法则强调以科学的方法展开经济史研究,特别强调统计方法;反对孤立地讨论经济现象,强调系统地分析经济史,避免空洞的论战。关注实证研究是指在两所的经济史研究中,前辈学者重视史料,勉力拓展史料来源,除传统史料外,还重视收集民间文书和组织社会调查。

二、国际视野与中西比较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王国斌教授以国际视野讨论历史中的环境问题,报告的题目是“Environmental Realities in Economic History: Today's Problems & Tomorrow's Possibilities(经济史中的环境现实:现在的问题和未来的可能性)”。他指出,近现代欧洲经济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关于增长的历史,对环境现实问题的研究有限。他以中国的水资源管理为例,阐述了中国社会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对于人、经济和环境三大核心要素的密切关注,并将之视为有别于近现代欧洲经济发展历史路径的对未来经济的一种诉求。

耶鲁大学张泰苏教授聚焦于“经济分流/合流问题的再思考”,指出以往研究东西方经济“分流”问题的基本思路是在横向比较的基础上进行抽象化分析,对“合流”问题的研究则更偏向于以纵向比较的方式进行。且以往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倾向于将“分流”和“合流”问题分开讨论。他认为,中西方经济的“分流”与“合流”问题存在内在的逻辑关系,二者的结合有助于寻找潜在有效的解释因素,而资本积累和国家能力恰好是少有的同时在“分流”的横向比较与“合流”的纵向比较中具有解释力的关键因素。

牛津大学翟润卓博士在题为“彭慕兰之后:东西方大分流和经济增长比较研究的最新进展”的报告中,梳理了二十年来国际学界在中西经济发展轨迹与比较研究中取得的成果,总结了加州学派在经济史研究中的贡献,并分享了他对清代中期是否存在经济高速增长的“High Qing”问题的回答。近二十年来,学者致力于构建涵盖世界经济长时段发展宏观微观指标的数据体系,包括工资、GDP及生产率、健康和福利等指标,翟润卓博士详细介绍了海内外各国在数据构建方面的最新进展。此外,通过构建反事实分析框架,他回应了学界对清代经济增长趋势的争议,指出中国在1750—1800年间人均耕地、亩产量与城市化率的实际表现,并不足以支持加州学派特别是彭慕兰对1750年发生中西分流的论断,因而至迟在1700年中国就发生了人均生产率的下降则是更合理的推测,“High Qing”现象并不存在。

三、史料挖掘、长时段分析与经济周期

香港岭南大学刘光临教授关注历史上的经济周期,在题为“数据和周期——如何研究宋金元之际的经济变动和国家财政”的报告中,以宋代至明初宏观人口、耕地数据的可靠性为切入点,重新审视期间的经济周期和元明财税制度。从数据来看,北宋时期中国经历了宏观经济的扩张周期;至明初洪武年间,南北方的人口变化趋势呈现差异,南方人口虽然少于南宋初期,但相对于北宋初期仍有所增长,北方人口不仅少于北宋初期,且相对于南宋初期减少了约六分之五;结合耕牛等生产资料的数据,则可推知,明初中国北方的农业生产方式相比于北宋中期,经历了严重的倒退,由具有一定市场化程度的集约型农业,倒退为具有国家计划强制性的自给农业。刘光临教授指出,从国家权力运行的视角重新审视宋代至明初的人口统计和税收制度,我们能够对历史上封建王朝的制度设计和选择得到更深刻的思考,做出更公正的评价。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高超群研究员的报告题为“国家与企业——试谈在企业史研究中如何突破断代界限”。以在企业史研究中观察到的一些周期性变化为例,讲述了他在企业史研究中突破断代界限的尝试。他以长期视角观察对比明清、晚清至当代企业经营发展中存在的国营、民营两种企业形式的相对扩张与收缩,地方财政税收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变迁,和国家与企业产权关系中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在资源投入、利益分配、特许经营等政商关系等方面的特征。高超群研究员基于以上三类企业史中呈现周期性、共通性特点的现象,提出了几点问题和思考,强调突破断代界限研究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上海交通大学袁为鹏教授则从史料发掘与运用方面,分享了他和他所带领团队在工商业账簿研究方面的最新成果。他指出,中国的企业史研究中存在忽略明清以来企业发展成功经验,并将行业史等同于企业史,忽视企业微观层面的经营活动和组织方式,对企业中不同角色特别是工人等中下层人物的研究严重不足,对企业面临的市场、政策和社会文化环境的分析过于抽象等问题。商业账簿的整理与利用或能在以上几方面发力,推进和丰富企业史研究。进而袁为鹏教授评价了商业账簿的史料价值,回顾了经济史研究中的商业账簿利用史,介绍了当前商业账簿的整理研究现状和主要成果。最后,袁为鹏教授对企业史研究中如何利用工商业账簿展开深入讨论,并作出展望。

四、财政、货币与金融研究

武汉大学陈锋教授就“近四十年中国财政史研究的进展与缺失”话题进行探讨。他强调,近四十年来中国财政史研究的繁荣景象突出表现为:新研究材料的发掘和运用促进了相关问题的研究;财政通史、断代财政史、专题史与相关论文集的出版空前活跃;新方法和新事业屡屡展现。不过,他也指出目前财政史研究仍存在的问题与缺失:财政学与历史学对财政史的研究各自为政;一般历史研究和研究室研究对财政问题的漠视;选题重复,论著“复制”;学术规范过程中的不规范;研究时段的不平衡与研究问题的阙失。

河北师范大学戴建兵教授以“新时代看日本对中国货币史的研究”为题对相关内容进行分享。他认为,货币史研究者应具备三要件:对钱币学的了解;对经济学和货币理论的掌握;对经济学方法与历史学方法的双向把握。他以近代日本学者宫下中雄为例,指出宫下中雄在研究近代中国货币史时呈现的突出特点:其一是基于外国人的视角,充分关注近代中国货币状态与货币种类;其二是运用经济学理论分析银两制度,深刻揭示近代中国货币体系架构的内在机制;其三是准确把握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属性,揭示银两制度背后始终存在外国势力的强大影响。

上海财经大学燕红忠教授聚焦于市场视野中的重要创新,总结了近代货币信用发展的特点。在题为“市场竞争视野下的货币制度——近代中国货币信用的发展特点”的报告中,燕红忠教授详细分析了产生于市场的一系列便于交易的货币与信用制度安排——虚银、过账、票据与清算体系四者之间的逻辑关系;总结了近代货币信用发展的四大特点;并对近代中国基于市场的货币信用发展作出评价,指出竞争性的货币发行在抑制通货膨胀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虚银两等货币信用创新也提升了货币体系的运行效率。他强调采用更倾向于市场的观点展开货币制度史和货币史的研究,能够对近代中国的多样化货币实践做出合理的解释。

武汉大学彭凯翔教授的报告围绕明清时期金融组织及其演进展开。通过对晚明至清末民初金融组织中代表时代前沿的枢纽性机构和枢纽性市场变化的历史梳理,他补充和更正了一些现有研究和传统认识中的误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对典当铺性质的理解,报告中指出,除了作为平民消费信用机构外,典当铺的社会资金调度枢纽功能在晚明以来的经济生活中吸纳社会资金,并为商贸提供周转资金。彭凯翔教授对金融组织演进的效率——利率的比较分析显示,晚明以来商业借贷市场中的利率特别是顶层市场中的利率不断下降;而与欧洲的利率长期变化相比,中外都经历了利率

的急剧下降,但中国的利率断点晚于欧洲,出现在晚明;这一利率变化趋势,与传统史料和学界共识存在较大差异,提示我们利用商业文书和商业史料研究金融市场具有重要意义。最后,彭凯翔教授对金融组织的研究回归到制度研究的视野,讨论了金融组织演进的制度意义,也检视了经济史研究中的制度分析方法。

本次研讨会最后由《中国经济史研究》主编魏众研究员主持圆桌论坛并进行学术总结。他将十四场专题报告总结为:“形而上”——方法论与宏大叙事的深刻探讨反思,“形而下”——具体领域前沿性研究。前者向我们展示了中国的经济史学研究者应当以怎样的方法从事怎样的研究;后者分别从财政、金融、货币、人口、企业经营与发展、中西经济比较等领域做了回顾与前瞻。此外,参会者与报告嘉宾以开放讨论的形式展开问答和深入交流。

(责任编辑:马烈)

《“底色”顽韧:近代冀中定县小农经济的延续与渐变》简介

李金铮教授的专著《“底色”顽韧:近代冀中定县小农经济的延续与渐变》,2022年10月由中华书局出版。

本书主从区域社会经济史视角,以1849—1936年的冀中定县为时空范围,从人地比例、土地分配、家庭规模、农业生产、租佃关系、雇佣关系、家庭手工业、集市贸易、农民借贷、赋税负担、农家消费和乡建实验等方面,进行“解剖麻雀”式的阐述和分析。本书通过研究小农经济的结构、运作形态及其变迁,揭示农民生产与农民生存的动力机制,寻找本区域的特性以及与其他区域的共性,在与乡村社会经济史领域的先行研究进行对话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解释。

小农经济既是一个历史命题,也是一个现实命题。本书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观点:一是乡村社会、农民生活无论经历了多少苦难,终究还是坚持下来并成为支撑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重要力量,其秘密就在于小农经济的艰难存续,此为乡村的重要遗产。二是传统和现代、本土和域外的交织是近代小农经济演变的基本动力和基本线索,以传统和本土的连续性为主、现代和域外的零星影响为辅,共同维护了传统小农经营模式的延续和渐变,在遭受苦难中仍保持顽韧的生命力,是小农经济的底色。三是如果说以上两点为宏观认识,亦有较为具体的看法。譬如:人均耕地较少,但人口对耕地尚未构成沉重的压力,由此成为小农经济延续的一个基石;土地分配相对分散、绝对集中的稳定趋势,是小农经济延续的重要力量;追求理想大家庭与5口之家普遍存在的格局,凸显了小农经济和家庭规模的特性;小农业生产已有现代迹象,但仍以传统经营为主,劳动生产率低下,不过粮食总产量和亩产量基本保证了农民的生存效用;纯粹的地主和佃农都比较少见,租佃之间更多表现为普通农民之间的复杂关系,主佃关系相对缓和;雇佣关系为长工和短工的结合,雇工工资基本体现了自身价值和供求变化,其生活水平不一定是最低的;家庭手工业仍在延续和发展之中,有的手工业的衰落不一定是外国货物冲击的结果;新式借贷虽很微弱,但惠及到了普通农户,一定程度上压低了传统借贷利率;农家的人均摄入热量和蛋白质水平仍属低级生存性消费,人均寿命低。本书将近代冀中小农经济的基本形态概括为:在平原生态和人均耕地较少、地权分配不均的条件下,通过自耕农、佃农和雇农的多种经营,小农业和手工业的主辅生产,集市交易和借贷关系的调节渗透,形成了一种“自主”、勤勉但勉强糊口的贫困经济。在此经济构造中,国家权力和民间团体的力量都是有限的。(邓红)